

全球化治理全球化

孙 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尽管反对和质疑之声始终伴随着这一轮全球化浪潮,英国脱欧,特别是特朗普执政后的一系列政策使得人们不能再无视逆全球化的动向。它不仅是两个世界主要国家投票的结果,而且正在变成越来越具体的政府行为。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逆全球化可能是对过去二十多年来全球化高速扩张后向常态回归的一个过程,至少经济全球化水平不会发生大的逆转。

一、全球化进程放缓的原因

2013年麦肯锡的一篇报告就已经发现了金融全球化明显放缓,2014年4月7日的美国《时代》周刊发表的题为“逆向全球化”的文章更指出全球经济一体化在逆转。但是,逆全球化问题真正受到关注还是源自特朗普提出退出TPP、联合国和WTO,明确要优先保障美国利益,将工作带回美国,甚至修建美墨边界墙以及移民和难民限制等政策带来的强烈冲击。

本轮全球化浪潮兴起于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名为和平红利,实为发达国家试图倚仗自身的资本和技术优势在全球扩大自己的影响并占领世界市场。因此,全球化曾被视为美国化。但恰逢此时,中国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大幅度推进了改革开放和融入世界的进程,所以中国的崛起也被公认为得益于全球化,结果全球化已经不能再等同于美国化了。在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西方国家相对实力下降,国际经济格局面临重大调整。面对这种始料不及的情况,西方国家一方面指责中国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搭便车,不遵守国际规则,进行不公平竞争,这表明了它们对中国在全球化潮流中实现崛起的复杂情绪;另一方面,它们先是试图制定新的国际规则拒中国于国际社会之外,此后则索性转向逆全球化。

二、全球化中出现的问题

全球化从来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早在2003年,斯蒂格利茨就出版了《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当时他已经指出,代表发达国家利益的IMF和世界银行所推行的全球化就是要把“华盛顿共识”强加于发展中国家,并警告这将引发种种恶果。应该看到,斯蒂格利茨的本意并不是要否定全球化,因为问题不在于全球化本身,而在于全球化的方式。

在全球化中,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产业才是最大受益者,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但是这些回报大都被金融寡头和精英所攫取,出现严重的分配不公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普遍提高国内各阶层的福利就需要分配制度的保证。因此,斯蒂格利茨在2006年又出版了《让全球化造福全球》一书,专门讨论了这些被传统实证经济学忽视的规范问题,可惜多年来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由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发达国家传统的农业和制造业等“旧经济部门”的蓝领产业工人所受到的冲击最大,在经济转型中面临结构性失业,对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不满持续加剧,进而对政治和商务精英产生深深的不信任。这些因素帮助特朗普赢得大选,在英国脱欧公投中也有类似情况。但是,美国贸易优势并不在于普通制造业,这些部门的盲目回归不符合国际贸易的原理,也不符合美国

的利益。美国教育程度不高的工人失业是经济模式转型造成的阵痛,是一种结构性失业,不能单纯指望通过保护贸易政策得到解决。底特律的衰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美国政府应该做的是适应产业结构的升级,推进国内改革,特别是下大力气办教育,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而不是简单地把就业带回美国。这样做不仅不会使美国再次强大,而且会使美国进一步衰落。

三、逆全球化不会长期存在的原因

事实上,美国的优势更在于吸引全球人才的能力。特朗普执政以后收紧移民政策,给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带来困难,而这对于美国来说恰恰是事关重大的问题。即使对发达国家普通民众和蓝领工人的生活而言,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商品,也提高了他们的购买力水平。如果采取逆全球化政策,不讲贸易优势,美国企业的成本就会上升,物价也会上升,人民的福利水平就会下降。

最重要的是,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政策主张。20世纪30年的贸易战和货币战经历说明,没有人能够幸免于混乱的国际经济秩序。保护主义、逆全球化和孤立主义都是不可取的。

尽管逆全球化思潮泛起,我们还是应该看到驱动全球化的因素依然会发挥作用。毫无疑问,降低成本是全球化的一个主要动力,而逆全球化必然造成成本上升和国际竞争力下降。从这个逻辑上说,逆全球化要能持续,就需要避免出现这种不利的局面,而这至少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技术进步造成的成本下降可以抵消逆全球化造成的成本上升,从而维持产品竞争力;二是逆全球化产品的竞争性或替代性产品的生产也要同步转向逆全球化,才能使得逆全球化产品才不会在竞争中丧失优势。从当前的情况来看,这两个前提条件很难存在,因而长期的逆全球化是有难度的。保护主义可能在短期内给世界经济带来一些负面冲击,但是不会持久。

四、全球化进入新常态

2016年12月,IMF的《金融与发展》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重置全球化”的文章。作者的基本观点也是不认同逆全球化,而是认为当前的全球化被叠加上太多的程序和任务,不堪重负,需要重新设置全球化,以便顺利地运行下去。作者认为此前的全球化可能是一种超调状态,而国际投资和贸易5%左右的增长更可能是一种值得期待的适度水平,也就是说当前的金融全球化程度也许才是恰如其新的新常态。

就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增长速度落后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原因,一般也被认为是结构性因素要大于需求因素。这些结构性因素又包括三个方面:首先随着经济发展,服务占比越来越大,而服务贸易的收入弹性又小于货物贸易,所以总贸易的收入弹性不断下降,GDP增长对贸易增长的拉动力就会减弱;其次是全球化红利的衰减,主要表现为中国和中东欧国家融入世界经济后给全球贸易带来的影响已经常态化,增长率出现下降;最后,全球价值链扩张给国际贸易增长带来的拉动作用也在逐渐下降。其实从这个意义上看,贸易全球化的停滞恰恰反映了全球化作用和影响得到了充分发挥。

所以,与其说当前出现了逆全球化,不如说是全球化正在改变,是全球化和整个世界经济不断走向成熟和稳定的新常态,而不是全球化的停滞或逆转。

五、全球化治理全球化

应该看到,当前全球化所出现的挑战恰恰是伴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管控全球问题的能力落后于不断出现的复杂和紧迫的问题造成的。正如在城市化迅猛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种种城市病,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有人向往田园生活就因此否定城市化一样。问题不是全球化本身,而是如何管理全球化的进程以及随之产生的问题。

从国际角度看,全球化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治理的改革进程。在当前的国际经济格局中,单纯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本身是不够的,更需要国际合作,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合作。全球问题超越了国家和地区的边界,各国又有不同的诉求,要协调一致就必须有足够

的诚意承担各自的责任和义务。要解决当前全球化带来的一些负面冲击,出路不是退回贸易保护主义。要相信理论和历史,要正视全球化高速推进中出现的问题,要强化全球治理,才能实现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这最终需要各国政府的共识、勇气和决心,通过全球化来治理全球化。

新时代世界经济新趋势及对策

贺力平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一些深刻变化,这些变化与经济全球化的演变有着密切关系。主要大国经济规模的相对变化,经济政策的调整以及新技术进步等因素都使得当今的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以各国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仍然在继续,但是各国参与的方式方法正在发生一些重要变化。经济全球化正面临走向升级版的严重挑战。未来,经济全球化的面貌还将会有新景象。我们可以从国际贸易增长、经常账户平衡、国际投资流动以及各国实际利率等多个指标的变动来观察和认知这些变化。

第一,国际贸易增速趋缓。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国际贸易增长速度超过各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速度。1980~2007年期间,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口径,世界GDP年平均增长率为3.53%,世界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量年平均增长率为6.09%,后者比前者高出2.56个百分点。如果从冷战结束的1991年算起,世界GDP年平均增长率在1991~2007年期间为3.74%,世界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量年平均增长率为6.96%,后者比前者高出3.22个百分点。但在2008~2017年期间,这种对比关系发生了逆转。在这个时期,世界GDP年平均增长率为3.33%,世界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量年平均增长率仅为3.17%,后者比前者低了0.16个百分点。

导致国际贸易增长趋缓的直接基本原因是世界经济增速的减速。各国产出的减速是对外需求减速的直接基本原因,后者又进一步引起各国对外出口的减速。

第二,全球经济不平衡(global imbalance)的指标有所改善。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国际社会广泛谈论“全球经济不平衡”,并以若干大型经济体的经常账户失衡(CA)与其GDP的比率来度量。以美国为例,1991年经常账户顺差与GDP比率为0.05%,2007年经常账户逆差与GDP比率却高达-4.91%。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与GDP比率在2007年也高达9.89%。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除个别国家外,主要经济体的经常账户平衡(失衡)与GDP的比率都不同程度出现了下降。美国经常账户逆差与GDP比率在2016年和2017年下降到2.38%~2.42%区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与GDP比率则下降到1.4%~1.7%的水平。

主要经济体经常账户失衡的降低意味着从流量指标上看,各国对外部资金市场的依赖程度有所减轻。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国际资金市场对各国贸易增长的支持相对减弱。

第三,国际直接投资增速相对下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按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的统计,世界各国对外直接投资(FDI)流量达到创纪录的1.9万亿美元,其中发达经济体贡献了近1.3万亿美元。但自那以来,世界各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很少超过1.5万亿美元,仅在2015年恢复到略超过1.9

万亿美元的水平。同时,发达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最高年份 2015 年仅为 1.1 万亿美元稍多,未恢复到此前的历史最高水平。

事实上,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仅有包括中国在内的少数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ODI)出现了大幅度增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 2007 年仅有 250 亿美元,其中多数流向资源充足国的矿产地。到 2015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高达近 1500 亿美元,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

世界范围内直接投资流通的趋缓,反映了产出增长和国际贸易增长减速的影响,同时也说明,在发达经济体内部以及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传统类型的直接投资机会在逐渐消退。

第四,实际利率在许多经济体出现了下降趋势或者长久地处于低水平状态。人们通常使用金融市场流行的拆借利率减去一国通货膨胀率(CPI、PPI 或 GDP 平减指数)来表示实际利率。已有许多估算表明,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实际利率一直处于低位。这不仅源于那里的货币当局实行了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货币政策,而且更重要地是源于通货膨胀的低下。导致低通胀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如产出增长率趋缓,投资回报率下降,劳工市场弹性的增强,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供给能力的扩大以及发达经济体减少了对传统能源进口的需求,等等。以互联网运用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进步虽然创造了许多新商机,但是,各国市场的分散性以及模仿者的普及也快速地降低了新技术进步的收益集中效应,从而也未能有效持久地提升投资回报率。

一方面,信息技术等领域内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不断加快;另一方面,投资回报率处于低位,这决定了世界经济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最可能得到温和增长。这也意味着,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到 21 世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平均增长率 3.74% 将很难再现。那个水平现在可以说是高增长率了,是全球化黄金时代的标志之一,也是那个时代世界市场外延性和内生性扩大的结果之一。未来,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将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内生性技术进步。

第五,世界各大板块经济增长趋势互有差别,经济政策调整复杂多样。在 1991~2007 年期间,发达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平均经济增长率为 2.68%,发展中经济体为 5%,后者比前者高了 2.32 个百分点。在 2008~2017 年期间,发达经济体 GDP 平均增长率下滑到 1.22%,发展中经济体则上升至 5.08%,后者比前者超出 3.86 个百分点。但是,若看最近四年(2014~2017 年),发达经济体 GDP 平均增长率为 2.03%,发展中经济体为 4.48%,后者比前者仅多 2.45 个百分点。中国在 1991~2007 年期间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六年(2008~2013 年)中是支撑发展中经济体高速增长的主角。随着中国经济外向型发展经验在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得到普及和应用,以及来自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驱动力的减弱,未来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多地依靠内部市场。

如果说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各国内部市场的对外开放、发达经济体的产业外包和外流、大宗商品国际需求的强劲增长等因素,那么,未来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都将或大或小地弱化或转向。尤其在未来全球化的政策规则和多边关系前景方面,各种不确定性目前正在增多。一些重要经济体正在谋求从现有国际经贸关系调整中得到新利益,或者促使他国做出让步。一定意义上,全球化所面临的挑战是迈向升级版的挑战。

我国选择对策的原则应是:一是坚持发展国内市场为主的思路,不应过多指望外部市场需求对国内经济的拉动作用;二是更多地为国内经济基于效率提升和持续性内生技术进步创造有利的社会经济体制条件,不断改善国内市场环境,减少市场扭曲,加大知识产权保护,有力提升市场的公平性和效率;三是积极探索国际多边贸易和投资体制的“升级版”,与支持全球化的国际社会良性互动,为未来全球化的顺利发展贡献“中国智慧”。